

从《芦荡火种》 到《沙家浜》

□陆建华



当年，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的改编、再创作成功，凝聚着主要执笔者汪曾祺等一大批创作人员的大量心血。但江青为了捞取政治资本，处心积虑地把一切功劳都划到她自己身上，将《沙家浜》定为样板戏后，隐去了真正的创作者，以至于时间一长，人们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谁是真正的创作者。直至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

1960年10月，汪曾祺在河北张家口劳动了整整两年之后，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。按理说，他可以返回北京，但原单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。在苦苦等待一年无果的情况下，心系文学的汪曾祺给他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同学、北京京剧团

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了一封求助信。杨毓珉立刻请示团里可否接受汪曾祺，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、团长肖甲等人都同意，但此事还须经过北京市人事局，而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，并且知道汪曾祺的名字，同意办理有关手续。就这样，1962年初，汪曾祺来到北京京剧团担任了专职编剧。

江青指令改编 沪剧《芦荡火种》

1963年下半年，展开了一场关于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、能不能演现代戏、怎样演现代戏的大讨论。经过激烈的争辩、分析，意见逐渐趋向一致：京剧在继承与发展传统戏的同时，应当积极创作、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

现代戏，与此同时，还要对京剧的表演程式和唱腔大胆进行改革。

1963年12月，中国戏剧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常务理事会议。会后，中宣部、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，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。这一决定，鼓舞了全国数以百计的京剧团迅速行动起来，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编演现代戏的活动之中。

就在这时，北京京剧团接到了一个现代戏剧本——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创作的沪剧《芦荡火种》。有关领导不无神秘地郑重关照：“这是江青同志交来的，要抓紧改编成京剧，尽快搬上舞台。”当时，不少人对“江青”这个名字还不甚了了，在了

解底细后又顿感肃然。这时的江青并没有什么职务，只是一个电影指导委员会的挂名委员。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：1963年下半年，一心想利用文艺捞取政治资本的江青，在上海期间看了许多戏剧、电影，其中爱华沪剧团的《红灯记》、人民沪剧团的《芦荡火种》引起她的极大兴趣。她决定把这两个本子拿过来，让水平高、影响大的首都剧团改编成京剧——把《红灯记》交给了中国京剧院，《芦荡火种》交给了北京京剧团。

首场彩排，遭到江青冷脸

北京京剧团接到沪剧《芦荡火种》的本子后，全团上下都很高兴。首先成立了创作组，由汪曾祺、杨毓珉、肖甲、薛恩厚四人组成，其中，肖甲是团长，薛恩厚是党委书记，杨毓珉是艺术室主任，剧本改编创作的主要执笔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汪曾祺的身上。他们住进颐和园的龙王庙，受当时大演现代戏热潮的鼓舞，加之沪剧《芦荡火种》原来的基础较好，连来带去不到一个星期，改编本就拿出来了，并迅速搬上了舞台。初稿定名为《地下联络员》，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，可以“叫座”。

最初，全剧围绕着阿庆嫂英勇机智、保护新四军伤病员的中心情节展开。剧中

的阿庆嫂由赵燕侠饰演，郭建光由谭元寿饰演，胡传魁由周和桐饰演，刁德一则由一位丑角演员饰演。首场彩排时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、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人都来看了。由于时间仓促和对原剧理解不深，加之从沪剧到京剧的改编下的功夫不够，演出效果不很理想，反应一般，江青尤感失望。上台接见演员时，江青冷着脸一句话也没说。而彭真、罗瑞卿对这个戏颇有好感，一边与演员热情握手，一边鼓励他们继续把戏改好。

尽管江青的态度让演员们有点失望，但多数领导认为，这出戏的基础不错，只要再下一番扎实的功夫，就一定能改好。彭真还多次鼓励：“我看这个戏能改好，你们不要泄气。”这样，大家的劲头又鼓起来了。1964年的初春，改编者们移师文化局招待所，每人分头改几场，然后由汪曾祺统稿，几场重头戏和一些重要唱段都出自他手，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的身份从此确立。这一次，前后用了十多天，定稿后，恢复了沪剧的原名《芦荡火种》。

深加工后出新出彩， 连演百余场

从沪剧到京剧的整个再改编过程中，编创人员认真思考，反复讨论。

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下功夫。汪曾祺认为，京剧传统戏曲中的人物大都存在性格简单化的缺点。为此，他反复研究沪剧《芦荡火种》的剧本，在改编时既吸收了原来剧本的长处，又做了大量的改进与提高，使剧中人物性格进一步丰富起来。如阿庆嫂，既要写出她作为茶馆老板娘的精明、干练、泼辣，又要写出她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机警、敏锐、智慧；如郭建光，要写出他在对敌斗争中是横眉冷对的无产阶级战士，在以沙奶奶为代表的人民群众面前则是甘为孺子牛的子弟兵；而对胡传魁、刁德一这两个反面人物，也绝不作简单的漫画式处理，特别是刁德一，甚至写出了他过人的分析研究特长，表现其狐狸般的狡诈与阴险，进一步反衬出与之针锋相对英勇斗争的阿庆嫂、郭建光的大智大勇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。

在注重人物塑造的同时，汪曾祺注意吸收传统京剧折子戏的长处，尽可能地把每场戏写得集中、紧凑，防止松散、拖沓。几十年过去，这出戏中的《智斗》、《授计》、《斥敌》等场早已成为脍炙人口、久演不衰的折子戏，既独立成篇，又是全剧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，闪烁着熠熠发光的迷人风采。

可以说，汪曾祺在改编中下功夫最大的是剧本的语言文学性。多年来，在京剧界流传着一个偏颇的看法，认为剧本只是给演员提供一个表现意象的框架。事实上也正是这样，京剧自从问世以来就存在文学性差、语言粗糙的毛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起了作用。比如《智斗》一场戏，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的“司令常来又常往，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”，阴险地提出了挑战：“新四军久在沙家浜，这棵大树有荫凉，你与他们常来往，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。”这时，阿庆嫂已洞察刁德一毒如蛇蝎的用心，表面上却不露声色，从容道来：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；摆开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；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；相逢开口笑，过后不思量；人一走，茶就凉，有什么周详不周详！”

这段唱词既准确、传神地表现了茶馆老板娘的职业特点，又软中带硬、脆生生地把刁德一顶了回去，连刁德一也不得不叹服阿庆嫂“说起话来滴水不漏”。戏演到这里，每次都是全场掌声不息。观众是在赞扬剧中人阿庆嫂的机警智慧，也是赞扬剧作家的巧思妙句。

汪曾祺最为自得的，也正是早已成为经典的《智斗》和《授计》两场戏。

《授计》中阿庆嫂有一句：“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”，京剧中一般很少有这种抒情式的唱词。后面连唱三个“怎么办”，将阿庆嫂对新四军伤病员的关切之情层层递进。《智斗》中的那段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”，也是传统京剧中少见的，西皮流水一般是七字一句，汪曾祺却用五言，他觉得这样才能烘托出气氛。当时负责唱腔设计的是马连良的琴师李慕良，他觉得五个字不好安腔，汪曾祺坚持请他再试。最后终于设计出来了，不仅很有特色、一唱成功，而且脍炙人口、广为流传。这段唱词最后的落脚“人一走，茶就凉”，完全是汪曾祺琢磨出来的，而不是抄来、借来的。如今这句话早已成了国人常用语。一次，汪曾祺就听到周总理在布置工作时最后加了一句，“可不要‘人一走，茶就凉’呀！”

在对剧本认真加工的同时，对演员阵容也做了加强和调整，其中最有力的一着，就是把正在长影厂拍电影的著名老生演员马长礼调回来出演刁德一。

1964年3月底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领导同志重新审看了再改编后的《芦荡火种》，觉得耳目一新，大加赞赏，当即批准对外公演。大幅海报贴出后，北京戏剧舞台上竟掀起了《芦荡火种》

热，盛况空前，一发不可收，连演了一百多场仍欲罢不能。彭真高兴地让《北京日报》专门为该剧上演发表社论，以表示祝贺。同时，报纸还刊登了许多评论文章和观众来信，人们一致称赞京剧《芦荡火种》既成功地表现了现代革命斗争生活，又不失传统京剧的浓郁韵味，是京剧艺术表现现代生活的一次成功尝试。在《芦荡火种》公演的那段时间里，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处处可以听到学唱声：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……”

毛主席指示 改名为《沙家浜》

1964年4月27日晚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邓小平、董必武、陈毅、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一道观看了京剧《芦荡火种》。剧终，领导人一起鼓掌，高兴地走上舞台接见演员，纷纷赞扬这是一出好戏。

接下来，京剧《芦荡火种》参加了1964年夏天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，北京京剧团参加演出的剧目还有《杜鹃山》。同时参加观摩演出的，还有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六号门》、《节振国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、《黛诺》等一大批现代京剧。在观摩演出期间，毛主席也看了几场戏，其中包括《芦荡火种》。他对该剧

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意见。汪曾祺一直认为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既是正确的，也是高明的艺术见解，对改好《沙家浜》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毛主席对《沙家浜》的指示，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：

一是京剧要有大段唱腔，老是散板、摇板，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；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，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剧现代戏，确实很少有“上板”的唱段，只有一点点散板摇板，或来一段流水、二六，《芦荡火种》中阿庆嫂的大段二黄慢板“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”，就是听取了毛主席的建议，才这样安排的。

二是关于《沙家浜》全剧结尾的处理。

沪剧《芦荡火种》原来的结尾是，新四军战士利用胡传魁娶亲之机，分别化装成吹鼓手、轿夫，出其不意地袭击成功。最初改编为京剧时，结尾也是这样处理的。毛主席认为，这样一来，结尾变成了一场闹剧，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。

应改成新四军从正面打进去。他说：“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，强调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，戏的结尾要打进去。”舞台实践充分证明，毛主席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，但也只是从艺术性、完整性方面考虑的，并没有牵涉到政治。后来却被江青发挥成“要突出武装斗争”，把剧中人物郭建光提到一号，把阿庆嫂压成二号，并提高到“究竟是武装斗争领导地下斗争，还是地下斗争领导武装斗争”这样



的原则高度，纯粹是无限上纲，胡搅蛮缠。江青还说彭真要通过这出戏来反对武装斗争，更是莫须有的诬陷。

三是把剧名改为《沙家浜》。

在这以前，谭震林也曾对《芦荡火种》这个剧名提过意见。他认为，《芦荡火种》所描写的这段历史时期，革命已成为燎原之势，不应再称之为“火种”了。毛主席

在看了京剧《芦荡火种》后，不乏幽默地说：“芦荡里都是水，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？再说，那时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，而是火焰了嘛！”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改剧名，他说：“这个故事发生在沙家浜，中国有许多戏采用地名为戏名，这出戏就叫《沙家浜》吧！”

江青宣布这出戏归她管

江青得知京剧《芦荡火种》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消息，是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看《北京日报》时偶然发现的。她断定这出戏肯定是进行了加工提高。回到北京的当晚，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去看《芦荡火种》，戏一结束就直奔后台，大发雷霆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没经过我就公演了！”接着，

她又霸道地宣布：“这出戏是我管的……彭真给你们发了一篇社论，我以后让《人民日报》连发两篇社论！”这样一来，《芦荡火种》和后来的《沙家浜》就被看成是江青亲自抓的样板戏，北京京剧团也被看成是江青的文艺阵地。从此，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所有演职人员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再也不敢安宁了。⑤